



SHEHUI ZHUANXINGQI
LIAONING ZHIYE JIEGOU YANJIU

社会转型期 辽宁职业结构研究

王立波◎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辽宁省教育厅高校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SHEHUI ZHUANXINGQI
LIAONING ZHIYE JIEGOU YANJIU

社会转型期 辽宁职业结构研究

王立波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期辽宁职业结构研究/王立波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4

(学术前沿研究)

ISBN 978-7-303-18442-2

I. ①社… II. ①王… III. ①职业—结构—研究—辽宁
IV. ①D66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8658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 //gaojiao. bnup. com
电 子 信 箱 gaojiao@bnupg. 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 bnup. 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230 mm
印 张: 13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 00 元

策划编辑: 刘松弢	责任编辑: 谭徐锋 刘松弢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校对: 王 婉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前 言

改革开放以后，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意义最大的、最为根本的变化就是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所谓社会分层是对社会的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是从人们社会地位结构变化的过程、轨迹以及结果的角度观察社会。

在现代社会，职业地位已成为人们社会地位的风向标，职业与个人收入、财产、教育水平、生活方式高度相关，职业最有力地体现了个人的物质报酬、个人的社会声望，职业分层也成为社会分层的最根本、最主要的指标。由于职业结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直接反映了经济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对职业结构及结构变迁过程——职业流动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结构变迁的动态轨迹，因此，职业结构变迁研究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之一是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辽宁老工业基地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由国家财政投资建设发展起来，至今仍是除京、津、沪直辖市以外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形成了从南向北、从东向西推进的“梯度发展格局”，东南沿海地区迅速发展起来，而以辽宁为代表的老工业基地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对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带有自我职业选择特征的农民工问题在这里并不明显，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后工业化”特征的下岗失业工人问题，老工业基地面临着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的社会事实。

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不同于早发型工业化国家因产业结构调整或矿业资源枯竭而形成的大工业聚集区。这种区别在于它们形成的社会历史过程和制度背景的不同，前者是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的相对单纯的产业转型，后者则是在产业转型的同时伴随着由计划向市场的体制转型，双重转型的压力形成中国老工业基地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这种区别也在于经历这种转型的劳动组织不同，中国的劳动组织曾经是国家行政权力向经济领域的扩展，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劳动组织首先面临着自身的转型，也面临着由计划到市场的一系列的劳动关系、产权关系的变革，在计划和市场的磨合期国有企业所有者的缺位、资产的流失等都加大了老工业基地的转型成本；这种区别还在于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中的劳动群体不同，早发型工业化国家的老工业聚集区的劳动群体，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主体自由选择条件的社会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的劳动群体，在改革前是与新中国紧密相关的单位人，他们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国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和福利保障上对他们有着相应的制度承诺。

2 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也不同于曾经有过计划经济历史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老工业基地。苏东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私有化和迅速的市场化，同时也伴随着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体系的中断，在以往的国有经济主体消失以后，国家也中断了与原有国企社会的责任关系。中国改革的市场化不仅是渐进的，而且，作为主体的国有经济领域、传统的产权形式、管理体制和单位制社会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或者说没有表现出根本性变化，在市场化条件下，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日益巩固和强大，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实际是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与改革后的现实社会相联系的纽带；它不仅有别于早发型工业化国家，也不同于改革后的苏东社会，而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结构类型。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代表的计划经济的浅水区，伴随着农民快速城市化、乡镇企业迅速崛起的市场化过程。那么改革发展的现阶段，中国现实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则是在计划经济的深水区所发生的，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型交织在一起、体制内社会和体制外社会并存，以传统体制作用的领域更宽、作用程度更强的老工业基地社会结构变迁为典型代表。因此，在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充分认识老工业基地的社会结构，可能是社会学中国化亟须研究的对象，是解析中国式发展道路的关键环节，也是社会学研究更紧密地回应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需要。本书正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试图通过解析辽宁职业结构的变迁来理解中国当下社会结构最显著的特征以及这种特征的演变趋势。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问卷调查的数据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课题组在2006年1月至3月在辽宁收集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阶段复合抽样的办法，在辽宁的十大城市：沈阳、抚顺、营口、锦州、大连、阜新、鞍山、辽阳、丹东、本溪进行，各市抽取两个区，每个区抽取一个街道办事处（沈阳抽取两个街道办事处），共20个街道办事处，再从每个街道办事处中随机抽取一个社区，再根据社区的人口登记簿随机抽取50户左右的家庭，将访问户25~65岁的有职业经历的人口按年龄排序，根据入户抽样表抽出调查对象，计划样本1100份，有效样本990份。样本的基本情况是男性占47.6%，女性占52.4%，年龄34岁以下占21.2%，35~44岁占17.2%，45~54岁占41.5%，55~70岁占20.2%，平均年龄42岁，家庭平均月收入1915元，家庭平均人口3.16人，本人平均月收入1098.5元。此外第二部分是本研究进行的零工市场调查，调查时间为2007年4月，采用判断抽样的方式，在沈阳的8个规模不同的零工市场进行，计划样本400人，回收有效访谈问卷390份。平均年龄41.7岁，平均月收入为832.4元。

个案访谈的数据也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2005年7月，课题组把问卷的试调查和对下岗失业工人的个案访谈结合起来，在辽宁的7个城市对58名下岗失业工人进行了深入访谈，使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生动和真实可靠。第二部分是在零工市场的问卷调查中就零工市场的运行机制同步对30名零工进行了个案访谈。

研究的基本内容：

第一，老工业基地职业结构变迁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一章集中探讨了职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的学术资源，通过对古典和当代西方社会分层与职业分层研究的梳理，描述了职业分层和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发展阶段以及各学派的研究特点；通过对当代西方社会流动与职业流动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研究以及相关研究技术发展过程的概述，展现了国外相关研究的结构和基本方法。同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和职业分层研究的现状和发展阶段也进行了梳理。第二章在国际比较的视角下集中论述了中国老工业基地的特殊性，老工业基地问题是工业化国家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但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无论是发生背景、劳动组织还是劳动群体都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都充分表现了中国式的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是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双重力量形塑的结果。因此，对老工业基地职业结构变迁的研究作为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老工业基地的特殊社会结构类型的研究，而具有了较高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二，辽宁职业结构变迁的研究。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集中探讨了辽宁职业分布结构、职业声望结构和职业性别结构。其一，职业分布结构的文献研究。通过对第三次、第四次及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的整理，分析了辽宁人口职业结构变迁与广东、浙江两省以及全国总体变迁趋势的差异，发现辽宁人口职业结构变迁是一个农林牧渔业人员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和工业在业人数比例大幅度下降两种趋势并存的局面，这两种趋势表明辽宁的职业结构变迁具有“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双重特征，这种职业结构变迁过程是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型双重作用的结果，也是国家和市场的双向挤压和形塑的结果。其二，职业声望结构的调查研究。以2006年的990个辽宁城镇居民的调查样本数据为基础，通过与相关调查的比较发现：辽宁的职业声望的等级结构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特点，对行政权力的尊崇在职业声望评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反映出辽宁市场化的过程中再分配体制力量依旧保持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其三，职业性别结构的研究。这是职业结构研究的一个独特的视角，根据第三次、第四次及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资料，通过与同时期广东和全国的职业性别结构的比较，探讨了辽宁老工业基地不同职业群体性别结构变化的趋势和特点，分析了职业水平隔离和垂直隔离的趋势及其形成原因，描述出辽宁职业性别结构的区域特征。其四，辽宁职业结构变迁过程——职业流动研究。第六章主要探讨了职业结构代际转换过程中，职业资源的内在传递方式、途径和原因。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汇总和分析，发现辽宁社会尽管存在较高的代际职业流动率和向上流动的趋势，但是优势职业被优势群体所控制的倾向也非常明显，生产工人等职业也表现出了较强的代际继承性，职业流动的结构性制约依然存在，这种制约也是两种体制的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第三，辽宁社会阶级、阶层意识的研究。第七章和第八章主要探讨了职业结构的主观状态。阶级和阶层意识是处于一定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人对社会结构状况及其自身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认知，这是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视角。通过对转型期老工业基地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人们的主观世界存在着内在冲突，这种冲突是两种体制以及传统和现实博弈的结果。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和不同职业层级间也存在着阶级和阶层认知上的较大差异。此外，还就老工业基地典型的社会问题——失业群体的转型适应和社会认同进行了研究。

第四，辽宁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研究。第九章和第十章集中探讨了老工业基地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处于边界状态的劳动力市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

由于政治、经济等外在制度因素或者经济内生因素的制约，使劳动力市场或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不同运行规则的领域，不同的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提升的机会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且劳动者很难在不同的市场之间流动。不同劳动力市场的终端是从事不同职业的企业和劳动者，劳动力市场分割结构是职业结构研究的另一个层面，职业分层结构的变迁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的结果。研究发现辽宁具有复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不仅存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而且城市社会也存在着初级和次级以及核心和外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两岸，还存在着城乡混合的处于边界状态的劳动力市场，辽宁劳动力市场结构独具特点的适应、变异和分化也是中国社会结构复杂性的集中表现。此外，还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对边界劳动力市场——马路市场在国家 and 中介组织缺失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主体“马路天使”进行了实证研究。

目 录

第一章 职业结构变迁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1)
第一节 社会分层理论与职业分层研究	(1)
第二节 中国社会分层与职业分层研究	(12)
第二章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社会结构性特征	(18)
第一节 后工业化与西方老工业基地问题	(19)
第二节 中国老工业基地的基本社会特征	(23)
第三节 研究的意义	(29)
第三章 辽宁的职业分布结构	(3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31)
第二节 辽宁职业结构及与广东、浙江之比较	(33)
第三节 辽宁职业结构与全国总趋势的比较	(38)
第四节 中国式发展道路的集中表现	(41)
第四章 辽宁的职业声望结构	(45)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45)
第二节 辽宁职业声望排序及其特点	(48)
第三节 辽宁职业声望与国内其他研究之比较	(52)
第四节 职业地位的自我评价	(55)
第五节 转世研究的尝试	(57)

第六节 结论与思考	(58)
第五章 辽宁的职业性别结构	(60)
第一节 研究的相关概念	(61)
第二节 职业性别结构研究综述	(63)
第三节 职业性别结构及职业性别隔离趋势	(71)
第四节 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因素探析	(83)
第五节 讨论与总结	(92)
第六章 辽宁的代际职业流动	(95)
第一节 代际职业流动研究综述	(95)
第二节 辽宁代际职业流动基本模式	(102)
第三节 辽宁代际职业流动影响因素分析	(107)
第四节 结论与思考	(109)
第七章 辽宁的阶级和阶层意识	(113)
第一节 阶级和阶层的主观认知	(114)
第二节 阶层分布结构的主观表象	(117)
第三节 阶层地位的自我认同	(121)
第四节 社会公平程度的判断	(125)
第五节 结论与思考	(129)
第八章 失业群体的社会适应与社会认同	(131)
第一节 研究的框架、概念和分析视角	(134)
第二节 大型国企下岗失业职工的现状	(136)
第三节 “群体”失业者的转型适应与社会认同分析	(139)
第四节 讨论与结论：单位习性与社会认同	(146)
第九章 辽宁的劳动力市场结构	(150)
第一节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150)
第二节 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	(153)
第三节 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特征	(157)
第四节 处于边界状态的劳动力市场	(164)
第五节 辽宁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思考	(167)

第十章 一个边界状态的劳动力市场：基于沈阳零工市场的调查	(170)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70)
第二节 “马路天使”：一个超底层群体	(173)
第三节 马路市场的运行规则	(180)
第四节 边界状态的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	(183)
参考文献	(187)
后 记	(195)

第一章

职业结构变迁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则是社会阶层结构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社会现象，因而被视为现代社会变迁的焦点，因此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领域。自1978年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建设以来，社会利益关系及社会结构问题始终为社会学者所关注，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

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所谓分层是对于社会的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也是从人们社会地位结构变化的角度观察社会，人们地位结构变化的本质是人们之间利益或资源占有关系的改变。而在现代社会，由于职业与个人收入、财产、教育水平、生活方式高度相关，职业最基本的规定了个人得到的物质报酬、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因而职业分层成为社会分层的最根本、最主要的指标，职业地位成为社会地位的指示器。因此，通过职业地位结构的变迁来研究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成为历代社会学家社会分层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社会分层理论与职业分层研究

社会分层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将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等级不同的

多个社会群体的一种方法。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研究论题,许多社会学理论大师都曾涉及这一论题并提出相关理论。同时,也有大量的社会学家专门从事社会分层研究,因此,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是成果繁多,理论层出不穷,并产生了许多分支研究领域。社会分层研究的主题与理论动向往往与社会变迁及社会思潮的新趋势紧密相关,因而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关注点和理论取向。

一、古典社会分层理论

社会分层研究领域尽管历史悠久、学派众多,但是人们一般认为经典社会分层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克思和韦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层及其政治后果做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长期以来这两派理论一直是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主导理论取向。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阶级理论

在社会学家最初开始讨论社会分化、社会冲突及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一度居于主导性的位置。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古典的社会阶层化理论的贡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他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与一定的历史过程相联系;形成阶级的主要因素是财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是由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所决定的。马克思也发现了阶级结构和职业结构相关性,在他的时代,他从更宏观的视角发现,在一切私有制社会里,脑力劳动的职业基本上都为统治阶级所垄断,体力劳动的职业则归属于劳动者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所从事的主要是体力劳动。而形成这种地位差别的原因是个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位置,这种位置由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所决定的,所以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也往往被称为“一元经济论”。

马克思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两极分化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冲突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社会变迁的动力,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尽管马克思也注意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要比这种简单分类更复杂,因为还存在着一些过渡性质的阶级、类阶级群体和阶级内部的分支(如地主、农民、流氓无产者)等,但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成熟将不断分化这些复杂成分,他们或者变为资产阶

级,或者最终与无产阶级为伍,而社会阶级结构最终简化为两极对立。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典型特征。

(二) 马克斯·韦伯的阶层理论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工业社会的兴起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形成了极大的挑战,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社会阶级分化愈演愈烈,越来越突破两大阶级的社会格局,于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应运而生。韦伯分层理论的核心是划分社会层次结构必须依据三重标准:财富经济标准;声望社会标准;权力政治标准。

经济标准即财富,是指社会成员在经济市场中的生活机遇。所谓生活机遇是个人用其经济收入来交换商品或劳务的能力,即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的能力,其中包括使自己受到良好教育以获得较好经济地位的能力。不同的职业拥有不同的专业技术,也就具有不同的市场状态、生活机遇或经济力量,能获得不同的收入水平,并在消费市场中占据不同的位置。社会标准是指个人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所得到的声誉和尊敬。在多数情况下,声望来自较高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的高低与职业地位的高低是高度统一的。按照这个标准,可以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不同的身份群体。所谓身份群体就是由那些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生活方式,并能从他人那里得到等量的身份尊敬的人所组成的群体。政治标准就是指权力。韦伯认为,权力就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即便在遇到反对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可能性。在韦伯看来,权力不仅取决于个人或群体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且也取决于个人或群体在科层制中的地位。权力是与相应的职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职位越高权力也越大,因而越有可能在遭遇反对意见时也能实现自己的意志。^①

古典社会分层理论中,如果说马克思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出发来进行阶级划分的阶级理论还具有某种超越职业分层的倾向,或者说在职业分层中仅仅关注到体力和脑力的职业分层的话,那么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则是以职业分层为基础的,无论是经济标准、政治标准还是社会标准都是建立在职业分层的基础之上的。

二、当代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与职业分层研究

20世纪中叶,社会分层研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

^① 刘艾玉:《劳动社会学教程》,2版,8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的核心领域之一，受到各大社会学流派的普遍关注。

(一) 戴维斯和穆尔的功能论

系统地对职业分层现象进行阐述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和穆尔二人。在现代工业社会，任何关于社会分层方面的理论，都包含着他们二人的一些观点。

戴维斯和穆尔提出社会分层就是指社会具有必要的不同功能的社会位置系统，由于不同的社会位置的功能不同、重要性不同，他们需要与具有不同才能、经过特殊训练、愿意从事该职业的人相匹配，工作者由此得到相应的物质享受的、情感愉悦的和自我发展的报酬。他们用“位置系统”的概念来说明社会阶层化现象的产生原因。他们认为如果把社会看作一个正在运转的体系，则社会必须将其成员安排到各种位置上去，使每一个安排到这种位置上的人都能发挥自己应尽的职能。由于各种社会位置的功能重要性是不同的，有些社会位置在社会生存的功能上比其他位置更重要（这种重要性由地位的独特性、可替代性和依赖性决定），该位置就处于社会的关键性位置，对社会就更重要；有些社会位置比其他社会位置更需要特殊的训练和才能，社会中只有少数有才能的人能加以训练，以获得这些职位所需要的技能，社会为了要吸引这些人就要在日后他们工作时给予更多的报酬；有些社会位置更让人感到愉快。因而，社会就需要根据每个位置的不同功能，给予不同的报酬作为诱因，即实行一种差别报酬制度。这种差别报酬制度既导致了社会分层，也为社会的存在与运转所需要。在功能论者看来，如果不给那些更重要、更难胜任的职业以更多的报酬和更多的荣誉，人们不会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不愿付出更多的努力，也不愿承担更大的责任。

戴维斯和穆尔是在职业分层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分层，把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统一起来，这一理论至今仍对学界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二) 图闵的冲突论

戴维斯和穆尔对社会位置和社会分层的功能论解释，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也招致了不少人的批评，冲突学派认为社会分层并不是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趋向或共同的社会需要，资源的稀缺性才是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最深刻社会根源。

第一，他们认为社会地位的差异是无法避免的。这一观点与结构功能学派相似，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应该受到社会的推崇。相反，他们强调社会不平等是利益不一致导致的，是由社会地位决定的社会待遇的不

合理性。第二，他们认为社会不平等总是导致剥削。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成员往往会利用自己的特权，剥削社会地位较低的成员。他们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制定或影响社会政策，为自己提供较高的社会报酬，并保护自己的利益。第三，权力和资源的垄断，强占社会财富，排斥无权力的其他社会成员，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他们被迫遵守由上层社会成员所制定的社会规范。

冲突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图闵在 1953 年提出了关于社会位置的功能重要性命题属于主观价值判断，社会分层具有限制人才的发掘和发展，造成社会敌意等负功能的观点。他认为所谓社会位置是由于功能重要性不同的理解有极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因为人们无法真实地证明各职业对工业社会的功能性意义，他认为职位的不可替代性往往并非取决于其功能性质，而常常是双方妥协的结果。有才能的人并非稀少，虽然人数上有限制，但更多的是结构性因素的结果。教育机会的限制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性因素，由于接受教育、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很高，而每个家庭所能负担的教育费用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这样无形中便埋没了很多人才。职位的继承性是另一个结构性因素，它造成了人们就业的非公平竞争性。基于这两个结构性因素，下层人的下一代同样会得不到好位置，并造成恶性循环。更何况那些占有好位置的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与地位还经常设置种种进入这些职业的障碍。物质报酬并非是吸引人才的最有效诱因，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报酬形态，在有些社会最吸引人的是权力。此外，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等也能吸引人，高低不等的社会位置的存在也有负功能。

总之，冲突论者认为，在现代社会分层体系中各种职业是相互依赖的，不同职业功能的大小实际上是无法相互比较的。另外，从事一些体面职业的人并不都是才智出众者，相反，有众多德才兼备的人因为有种种社会制度方面的限制而不能从事那些具有较高声望的职业。社会地位的高低、职业地位的高低是职业垄断和社会冲突的结果，是职业特权的表现。冲突论是从社会结构性因素去解释职业分层乃至社会分层的根源。

(三) 辛普森的供需论

美国社会学家辛普森于 1956 年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规律出发对功能论提出了修正，他认为：位置系统的重要与否是很难加以测量的，而人才的供需状况才决定了报酬，决定了社会位置的重要与否。

他认为人是社会的，而非经济的人，报酬也并不一定指物质报酬，而可以

是任何一种社会报酬。功能的重要性是难以测量的,但人才的供给与需求是可以测量的。就总体效应而言,医生、工人、农民都一样重要,但他们个别的边际效用是有差别的。用供需理论还可以解释社会高低不同的报酬的产生。医生的收入比大学教授高,原因是社会上每个人都需要医生,但并非每个人都需要大学教授,他们的社会需求不同,因此导致了他们所得的不同。同样,出名的球星极少,其供给也是远远低于需求的,因此,他们的市场价格,即他们的身份也就相当高了。^①

总之,从供需论来看,社会分层、职业的地位是由供给与需求决定的,那么,职业结构的变迁也同样是出于供需所确定的。供需论实际上为职业结构的变迁理论提供了另一个层面的解释,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四)格伦斯基的后涂尔干主义和职业分层研究

格伦斯基和索内森等人发现,涂尔干所强调的职业层次的结构化倾向越来越明显^②,这使得由于工作不同而导致的差异转换成为有意义的社会群体。他们指出,在当代社会,职业的概念及其分类已经被制度化,不同分类的差异体现在国家政策层面和个人行为层面。基于职业的分类,或者说基于生产领域的劳动分工,发展起来大量的同业联合体,如工会、行会等,这些联合体代表了职业群体的共同利益。职业群体转化为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政治群体,这些群体在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认为:阶级应该根据职业的分类来划分。

格伦斯基还做了一系列经验研究。他们分析了1975~2000年美国社会是否出现了阶级解构的现象^③。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从阶级对生活机会、政治行为、社会态度和消费实践等方面的影响来看,以往研究者划分的大分类阶级(big-class)的确出现了结构化程度降低,但根据职业分类划分的微观层次的阶级(micro-class)的结构化却持续存在,因此,他们得出结论,阶级结构的解构主要表现在传统的大分类阶级而不是微观阶级层面。格伦斯基把社会分层和职业分层十分明确地统一起来,认为在职业分层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分层是更有意义和更贴近实际的。

① 袁方、姚裕群主编:《劳动社会学》,105页,北京,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② [美]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16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③ [美]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17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